

解弢《小说话》与民初小说批评的演进

朱泽宝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解弢的《小说话》是第一部单行本小说话, 在民初小说批评史上地位特殊, 具有多重开创性意义。《小说话》超越当时常见的社会批评风气, 其中关于小说技法方面的讨论别树一帜, 多本色当行之论。它虽以传统话体形式编著而成, 但其中关于小说演进的见解对于当今的小说史撰写仍有参考价值。此外, 其中的中西小说比较批评目光锐利而又议论透辟, 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也具借鉴意义。《小说话》的开创性及其理论建树, 昭示着传统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在二十世纪初依然葆有蓬勃的生命力。

关键词: 解弢; 《小说话》; 话体批评; 小说技法; 小说史观; 比较批评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1)03-0141-08

中国小说话源远流长, 最早可溯至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1903年, 梁启超等人在《新小说》上连载《小说丛话》, 始得正式定名。自此, 各式小说话论著竞相出现, “其盛况之空前, 犹如宋代之诗话勃兴然。一时的报章杂志, 纷纷登载长短不一的小说话”^[1]。但在自晚清至民国初期的十余年时间内, 小说话皆发表于各类报刊上, 并没有单行本问世。直至1919年, 中华书局出版解弢的《小说话》, 才打破这一局面。解弢的具体生平待考, 除《小说话》外, 尚未见关于其生平、著作的相关记载。据《小说话》可知, 解弢为河北沧州人^①, 少年时曾至北京^②, 就学于顺天中学^③, 后参加革命党^④。解弢虽然可能不是纯粹的学者, 但其所涉猎的小说数量与种类极多, 且大多有其独到的见解。其《小说话》一书, 完全践行着话体批评的写作规范, 是传统意义上标准的小说“话”。虽《小说话》的书写形式根源于传统, 但其多元化的视角、卓绝的识见、新颖的观点, 均昭示着当时小说批评的最新动向。本文试图从剖析《小说话》的理论特质入手,

借以透视传统文学批评形式中的现代小说理论建树, 省察现代小说批评建立的多重路径。

一、《小说话》对小说技法论的开拓

因介于晚清与五四之间, 民国初年往往被视为小说理论批评发展的低潮期。有学者指出: “民初的小说理论仍然受到晚清小说理论的影响, 它们几乎未能摆脱晚清小说理论, 确立新的小说观念和理论体系, 开创新的局面。”^[2] 问世于1919年的《小说话》, 却在晚清小说理论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虽然其关于小说的性质、分类、功能等问题的看法未能超越梁启超、黄人、管达如、吕思勉等人的论述, 但关于小说技法的讨论却能别树一帜, 极有创见, 多本色当行之论, 能言人之未能言。这不仅可视为传统小说批评的延续, 更有开辟新境之意义。

清末民初的小说家多致力于小说与社会关系之讨论, 或集中于旧小说的优劣判断, 或畅谈

收稿日期: 2019-12-07; 修回日期: 2020-02-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小说话文献整理与研究”(CZW050)

作者简介: 朱泽宝, 河南固始人, 文学博士,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明方向: 清代、近代文学与文论; 联系邮箱: doublezzb@126.com

新小说应具之风貌。这样的研究多倾向于宏观的评价与指导。至于理想中的小说应如何创作,在具体的技法上有何应注意之处,却大多语焉不详。这实际上应是小说批评关注的核心问题。以论述细密见长的管达如的《说小说》为例,其谈“今日改良之方针”时,提出有四个方面必须注意,分别是“道德心宜充足”“知识宜求完备”“阅历宜求广博”“文学宜求高尚”^{[3](2353-2354)}。大抵言之,都是关于作家主体论的议论,并没有落实到具体写作方法的指导。解弢《小说话》则在小说创作的整体原则、谋篇布局之法、类型小说的细节呈现技巧等方面都有深刻的见解。如此密集地、多方面地探讨小说技法,在民初的小说话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首先,《小说话》认识到小说与其他文学体裁在内在特质上的区别,提出小说有其特殊的创作法则。他以《荡寇志》《野叟曝言》为反例,指出小说写作“别有一法”:“夫小说之事,宜谐不宜庄,宜虚不宜实,宜反不宜正,且宜迎合社会之心理,引之入胜,而从反面痛加棒喝,方可收变化之效。若笔笔正义,何若作五经演义耶!”^{[4](3161)}概而言之,小说创作的目的是要“迎合社会之心理”,而“谐”“虚”“反”不妨理解为迎合民众心理的手段与方法。这种见解,固然受到民初小说普遍追求闲适、诙谐风格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基于对小说文体特性的深刻理解。主张“谐”,意味着对普通市民阶层小说阅读趣味的认同;主张“虚”,则是对小说虚构性的推重;主张“反”,则是对小说独特的文体特性的省察。历代小说批评者们鼓吹的多是小说“辅翼经史”“类乎实录”的文体性质,赞赏的是小说与正统文体趋同的一面,而少有人敢挾取其中的异质元素而大加表彰。就连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其初衷也与“诗界革命”大抵相同,也不过将小说视为政治宣传的工具^⑤。《小说话》则明确反对将小说等同于“五经演义”,以“谐”“虚”“反”来规范小说创作。其间蕴含着对小说本位的坚守、对小说艺术属性的自信,以及探讨小说写作方法的深层自觉。

其次,《小说话》对小说的谋篇布局之法也

颇为关注,在评论历代经典小说时,常留意于其结构特色。如其论“安学海说十三妹”与“十三妹却婚允婚”为《儿女英雄传》之“两大结穴”^{[4](3160)},又论“《红楼》宝玉被打,为一大关键”^{[4](3180)}。正是由于作者饱览中外小说,且能留心此道,故能对中外小说的结构布局做一个整体的观察与总结。如其论外国小说时,说道:“欧美小说之构局,变格实多。有两截法,如《喋血酬恩记》之叙艺叙获是也。有前后倒置法,《歇洛克奇案》开场是也。有截梢作根法,《薄倖郎》是也。”^{[4](3176)}在博观中西小说的基础上,解弢试图总结普遍的创作规律,“章回小说之结构,有顺排法,有错排法。顺排法,回回相衔接。错排法,乃错综变化,次章与前章,或接或否。吾国小说多用顺排,西籍他述体多用错排”。其论小说的“起首结尾”时,还列举三种方法,分别是:“一、神龙见首不见尾法,《水浒》《西厢》是也;二、首尾照应法,《红楼》是也;三、乾龙无首法,欧美作者多用之,吾国未之见也。”^{[4](3181)}这不仅是对当时流行的各类小说做理论上的总结,更为后来的小说写作者提供了具体有效的创作指导。此外,《小说话》中关于小说行文的具体方法还多有精到之言,如论“作文要忙里偷闲,以苏阅者之气”“作画讲距离,作文亦须论时间”,等等,都堪比度人金针。

再次,《小说话》论类型小说的细节呈现技巧多有精彩之处。晚清民初,报刊发表小说时,多喜对小说进行分类、标目。如政治、历史、言情、社会、侦探、伦理、教育等小说都在不同阶段成为时代之宠儿。因此,谈小说者都不免对小说之分类以及各类小说之性质、功能发表议论。解弢《小说话》自不例外,而其中最精彩之处还是在论小说技法方面。如其论历史小说时,首先就谈到其间的虚实关系,“历史小说不能虚造事实,虚造而寓他意,则已非历史小说矣。若虚造而不寓他意,则既非历史小说,又非他种小说,直不成其为书。然若直演正史,则又成为白话历史,亦非历史小说。是则历史小说,贵能摭拾遗闻,以发历史之覆”^{[4](3168)}。他反对历史小说中的虚构成分,所以《三国演义》就入不了他的法

眼，当然这难免有武断之嫌；他也反对简单地直述史书大意，所以《东周列国志》几乎不在其讨论之列。重要的是，《小说话》提出的处理历史小说虚实问题的独家秘诀，即在敷演历史大事的同时，“贵能摭拾遗闻”，在其间穿插各类新奇而真实存在过的野史轶闻，保证真实性，更兼生动性。这种理论虽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但自有其合理之处，而且与后来新式学者的观点也有暗合之处，像胡适说“凡做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5]。如何做到这点，胡适语焉不详，而解弢早就提出了一套可行的解决方案。

再如伦理小说，解弢直言其内在的创作困境，即“不庄则失体，过庄则无味”。他给出的解局之法是“于不庄之中而寓其庄”，并以《水浒传》写武松兄弟、《喋血酬恩记》写孝子及《鱼海泪波》为范例。他强烈反对“芟其讹行，独陈坚苦，意谓非若是，则不足以当其称且为他人法”的写作倾向。概而言之，解弢《小说话》提倡的伦理小说写作技巧，即是要在日常琐事中体现伦理规范，而不是让个人变为伦理道德的化身。应该说，提倡小说将重点放在生活琐事描写上，以事见情，以事达理，是解弢小说技法论的重要方面。他明确说道：“小说之擅长处，在能琐屑。夫记事空阔，则蹈于平庸，使人易忘。若点缀一二琐事，使阅者如旁亲见，则永留脑际，拂之不去矣。”^{[4](3169)}这不仅是对历史小说、伦理小说的要求，也是对小说创作一般规律的强调。事实上，其读小说也多关注小说中的“琐屑”描写，如谈小说的风景描写，谈小说对人物心理的细微刻画，都是以往的小说话所不曾注意的。

解弢在小说技法论上的一系列看法，其实也是对晚清小说界某些理论观点的反驳与修正，反映了民初小说理论的新变与突破。如《三国演义》一书，以解弢的理论视角来看，称不上是一流的小说；而晚清黄人在《小说小话》中却将其视为历史小说的典范，认为“历史小说，当以旧有之《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及新译之《金塔剖尸记》《火山报仇录》等为正格”^{[6](1472)}。在翻译小说的遣词用句方面，解弢《小说话》更是提出

了与晚清时代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时，林纾以桐城文法翻译的西方小说风行一时，邱炜萆的盛赞可代表当时的主流意见：“中国近有译者，署名冷红生笔，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读者但见马克之花魂、亚猛之泪渍、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7](417)}其欣赏的是“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的翻译策略与阅读效果，即在翻译中大量使用国人熟悉的典故、成语来表现欧美社会的风俗人情等。这也正是清末民初译介西籍的常见策略，就连被誉为“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世界文学史”^[8]的孙毓修的《欧美小说丛谈》，也是典故满纸，如其介绍《马尔达之犹太人》有“犹太人犹复数米而炊，鸡鸣而起……抚此千仓，视彼万箱”^{[9](2417)}等语。此类以中化西之译法，对于饱读经典的文化人来说，虽易领略其中意蕴，但此类译文已偏离原本意，实则也不利于国人借小说了解异国风俗的初衷。《小说话》就直斥这种风气，“译书不当引中国典故述西人口吻，张冠李戴，成何面目？”^{[4](3181)}可谓直击要害。

最后，解弢对写人、状物等方面也多有论述，兹不赘述。关于写作方法的讨论正是话体文学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⑥，从此着眼，则《小说话》的意义不仅在于小说技法论上的丰富与开拓，还在于其丰富的批评实践完善了小说话的话体批评体性，弥补了自晚清以来小说批评重外在的功能研究而轻内在的艺术特质研究的倾向。

二、《小说话》对小说史书写模式的探索

《小说话》出版于1919年，比近代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小说史——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要早一年。解弢的《小说话》当然不是小说史，但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小说演变意识，有意无意间体现着浓厚的建构小说史的意图。试将《小说话》的相关内容略加整合，即成一部粗具雏形的小说史，其间透露出的小说史观，对于今天的小说史撰写，亦有其启迪意义。

成熟的小说史观对于小说史的撰写不可或缺,解弢在《小说话》中对小说的发展脉络与演进规律有着全面的省察与独到的体会。他认为小说与文章的发展趋势绝不相同,“文章一道,今不如古,他科皆然,小说独否。盖古人为文,绘物言理,属辞比事,前无因袭,戛戛独造,故六经诸子,灿烂光辉。汉魏而后,则守旧成风,古人未言,率不敢道,𩇕𩇕𩇕祭,拉杂成篇,是以每况愈下。而小说一事,作者无文苑陪享之思,意所欲言,笔即随之,别开生面,不蹈故常”^{[4](3175)}。这样的理论建立在小说“别是一家”的自觉观念上,其深层意识是行文须“戛戛独造”“不蹈故常”。由于小说家特殊的写作心态,能够在文中畅所欲言,不必考虑因袭古人,故而小说的发展必然胜景无穷。这就使其在相关的立论中能摆脱传统诗文研究中常见的今不如昔的倾向,而更贴近小说史演变的实际。

在作者的创作心态之外,解弢还注意到读者心理、时代风尚等因素对小说演变的影响。如其谈到笔记小说时说:“笔记小说,古代不及今代。盖以古人简单之心理,不厌近人复杂之脑筋也。”^{[4](3188)}这充分考虑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对小说创作的反作用。在他看来,古代笔记小说往往故事简单、叙事简略,引不起读者的兴趣,现在的笔记小说作家要赢得读者注意,就必须在题材的选取、叙事策略等方面更费一番心思,这就必然推动笔记小说的发展。再比如,解弢还以民众的喜好来判断小说主题的时代变迁,“古为宗教时代,人喜谈怪。今为科学时代,人好求实,而小说亦因之变调。故昔之小说多言神怪豪侠,今之小说多言社会实况”^{[4](3217)}。应该说,解弢对小说演变的思考有其内在的缺陷,他多从单个因素寻找原因,而忽视政治背景、经济条件、文化政策、社会风尚等一系列因素可能发生的综合性、系统性影响,多少有简单化之嫌,但其视角新颖可喜,时有谈言微中之谛,反倒能在人所不察之处窥见奥秘所在。这就有利于全面考察小说史发展的源流脉络。不仅如此,解弢《小说话》还以史的眼光体察不同小说间的承继关系。如其提到“有谓《红楼》描写人物,脱胎《水浒》者,确

也”,“又有谓《红楼》之演炎凉,系仿照《金瓶梅》者,亦确也”^{[4](3172)},不仅引述前人的观点,还能举以例证,作出自己的判断,呈现出鲜明的“史”的思维,还原了小说史曾有过的某种呼应与嬗变。

解弢虽然整体上承认小说的发展今胜于昔,但也并没有机械地以时间之先后判定小说的高下,在涉及具体的经典小说品评时,还是综合考量其艺术成就、历史地位与社会影响等。其谈“章回小说,吾推《红楼》第一,《水浒》第二,《儒林外史》第三”^{[4](3161)},就没有按照时间先后来衡量优劣。解弢曾经试图对经典小说“次第其高下”,共分为三等十三种,详目如下:“甲等三种,第一《红楼梦》,第二《水浒传》,第三《儒林外史》;乙等八种,《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品花宝鉴》《隋唐演义》《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镜花缘》;丙等二种,《花月痕》《荡寇志》。”^{[4](3213)}这样的品第次序,《小说话》所独有,突破了“四大奇书”等经典序列的限制,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小说混合评价。这已经有了小说史的初步框架。“文学史通常对不同文体、不同作家、不同作品按文学成就的高下排出先后,安排篇幅大小。”^[10]如果说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将经典作品对号入座的话,那么解弢的小说史框架已经搭建,基石已经奠定,对于写哪些小说、又各占多大篇幅,已擘画停当。若以此判断标准为指导撰写一部小说史,必然极具学术个性,令人耳目一新。

就叙述策略而论,《小说话》在论述小说变迁时,已有相当多的篇幅,早于鲁迅采用开始“类别+时代”的写法。而“类别+时代”的写法向来被视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开创性成就之一,鲁迅对此也很自信,至其晚年还坚持这应为小说史的经典写法,“讲文学的著作,如果是所谓的‘史’,当然该以时代来区分……史总须以时代为经。一般文学史,则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11](576)}。而解弢已着其先鞭,比如其论社会小说时说,“《儒林外史》为吾国社会小说之开山,近今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及《官场现形记》等,皆传其衣钵”^{[4](3159)}。寥寥

数语，社会小说的源流已一目了然；如论神怪小说：“《西游记》及《封神演义》，神怪小说中之杰作也。其思想之宏阔奇伟，实令人惊服。”^{[4](3161)}指出其代表作与特色，可谓要言不烦。

更重要的是，解弢《小说话》在呈现出与鲁迅小说史编撰模式暗合之处的同时，还潜藏着相应的解构元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创的小说史论述框架一直影响到现在，以至有“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至今仍处在鲁迅时代”^{[12](85)}之说。解弢《小说话》在以类别为归纳总结小说演进的同时，也在某些地方显露出对此种书写模式的反抗与解构。相较分门别类地论述各类型小说的发展史，解弢更喜欢在对某类事实甚至琐细之事描写上比较小说的优劣高下。如其谈到“诲淫”问题，认为“《新齐谐》为第一。

《金瓶梅》等书，意在惩戒，《新齐谐》乃意在阐发”^{[4](3160)}。其论述古代小说叙战艺术的高下：“中国小说叙战，以《水浒》为第一，亦然瑕瑜互见，未能免俗。最可观者，为三打祝家庄入村迷路一节，及三打大名府为烧翠云楼一节。《三国演义》最为下乘。”如果沿此思路，将涉及这同类题材的小说加以整理，加以史断，就是一部“诲淫小说史”或“叙战小说史”。书中类似这样的判断，不胜枚举，写人、状物、绘景、叙事等都是其评价的着眼点。

以某一特定题材描写的优劣来评论小说高下，正与解弢“小说之擅长者，在能琐屑”的观点一脉相承。循着这一思路，诸多社会现象都可成为解弢比较小说高下的维度。应该说，以多元化的文化书写维度审察小说创作成就，以多种看似琐屑之事的描写来展现各类小说的文学史贡献，从而更公允地评价小说的特色与贡献。一般来说，小说包罗万象，涉及面众多，无论从哪一方面解读，总会造成更大范围内的遮蔽。《小说话》中蕴含的多元化、不于一尊的切入视角，不仅最大程度上拓宽了小说的阅读维度，有利于文本细读，还能促进经典小说丰富内容的多元呈现，更可以发现非经典小说中的文学史意义，如论《品花宝鉴》善写名士要高于《红楼梦》等名著。这样的写法有助于摆脱长期以来从单一角度

来评述小说作品的做法，从而能更真实地从多维度还原小说史的原貌。这对于今天的小说史撰写，仍有启迪意义。

三、《小说话》对比较文学批评的深化

由于诞生于中西文化密切交流的近代，《小说话》中有大量的关于中西小说比较的研究，其立论多能别具慧眼，切中要害，但长期以来没能进入相关的研究视野。学界早有论断：“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中国出现，则是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14]此前的探索，则常被视为萌芽期。所谓萌芽期内的成就，以往学界关注的焦点也仅集中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经典论文。实际上，晚清民国的小说话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比较文学资料，却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解弢的《小说话》没能被关注也是情理之中。正视以《小说话》为代表的这类文学批评文献，对于重新认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自梁启超起，无论是评价中国古代小说传统，还是畅想今后小说的改良方向，外国小说特别是欧美小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甚至可以说是价值尺度。晚清民初小说话涉及的中西文学比较，呈现出两种倾向：其一，大都指向小说的政治社会意义，从而导致小说的艺术性评价的严重缺失；其二，大多皆是泛泛的笼统之谈，甚至有捕风捉影之嫌，而缺少具体小说作品的比较与评价。这些都最终影响到中西小说比较的深度与精度。解弢《小说话》的出现，基本上扭转了这两种倾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比较在小说话中也正式展开。

解弢接触到的外国小说，数目繁多，种类丰富，这也决定了其在讨论某一话题时，能够博观中西，从容立论，不受各种偏见的裹挟，从而避免了浮泛之谈、偏激之论。如谈小说中写景之佳者，就中西并提，“写冬景之佳者，《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鬼山狼侠传》之白人失牛，《旅行述异》之罢猎饮至，皆可喜”^{[4](3162)}。这些都是中西小说并举，评价亦未掺杂个人偏嗜与民族

偏见,正是文学比较中应有的姿态与眼光。由于其以中正平和的态度深入文本阅读,故能多发现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彩之处。在其批评视野中,中国的小说在许多方面比起西方小说都毫不逊色。如其谈论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也从中西小说之中分别举出范例,“小说中写美人爱情,足为世界美人情种之模范者,吾华则推《红楼》之黛玉,欧西则推《茶花女遗事》之马克”^{[4](3184)}。《小说话》中的中西小说评鹭不仅限于具体作品,而且对双方的整体特征也时有全面的归纳。如其曾讨论二者谋篇布局、首尾结构等方面的不同,皆从容道来,阐述各自特点,更无扬西抑中之势。深受中国传统审美风尚影响的解弢甚至还认为中国小说的结尾方式要胜于欧美,“西洋小说,吾甚嫌其结局过促。往往千头万绪,归结一处,而以数行了之,使人心忙意乱,神气不宁。而彼间作者,方以斯为得意焉”^{[4](3175)}。就具体的小说类型而言,《小说话》也宣称“吾国言情小说,实可为世界冠”^{[4](3167)}。这里有没有切实的学理依据且不讨论,但这份气魄与自信,为后来比较文学批评者所不及。

纵览《小说话》中众多的中西小说比较之笔,解弢固然对中国传统小说多有肯定之处,但也并没有一味夸大其价值,而是能正视其中的不足。这其实也正是比较文学的意义。正如鲁迅所言:“欲扬宗邦之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爱生自觉。”^{[13](65)}在西方小说的镜照之下,解弢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省察与批判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必须指出的是,解弢的批判并不是当时舆论中常见的“诲淫诲盗”等论调,也不是在题材上区分高下,他更多是从艺术写法上着眼,深入文本内部,认真反思中国传统小说在写人、状物、绘景、抒情等方面的缺陷。如其盛赞西方小说的“格物之笔”,而此类笔法“最足为文章生色”,例举《喋血酬恩记》与《烟水愁城录》中的精彩片断以佐证,而后笔锋一转,道“中籍惟《水浒》石、杨于翠屏山杀人逃走后,轿夫登山见群鸦啄肠胃一笔为最妙”^{[4](3179)}。言外之意,中国古代小说中配得上称作“格物之笔”的也就《水浒传》中的这一段。其实,这种先例举西方

小说之优点,再以“惟”字等带出中国小说的相关描写,以见中国古代小说个别发达而整体落后的状况,是《小说话》中的常见写法。如论作者插科打诨之风格,认为“欧美小说,作者时与阅者作趣语,如演剧之丑角,与台下打诨然。吾国无其习。有之,惟《儿女英雄传》及《镜花缘》”^{[4](3192)}。论及我国社会小说应描绘贫家状况时,说“吾国昔无社会小说,故于贫家状况,多未述及。虽《儒林外史》,其中亦不多见,唯范进家为醜陋尽致,余则《红楼》之王狗家、《金瓶梅》之常峙节家而已。反观迭更司之书,则真可谓穷极色相”^{[4](3182)}。

大抵言之,解弢指出的中国小说落后于西方之处,又可分两种情形。其一,中国小说在描写题材的广度上远逊于西方小说。大致说来,中国小说所擅长的领域,西方小说均有相关杰作,而西方小说独擅之长,中国小说则常常不能比肩。如写贫家状况,写“海洋风物”,写“旅店食宿”的“荒伧之状”都是如此,甚至连“叙战事”都低西人一头。对于这些不足之处,解弢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而没有一味地贬斥本国小说之不竟。有时将原因归结于客观的社会经济情况,如论写“海洋风物”不如人,就说:“一则航业繁兴,一则闭关株守,何缘不让人独步哉?”^{[4](3175)}有时则将根本原因指向中西风尚的不同,如论写战争不及西人,指出:“西俗尚武,战争复繁,且行征兵之制,故文人学士,亦皆洞悉战阵景象,此文章逼真所由来也。至中土文士,率手无搏鸡之力。偶逢战事,则携室而逃,迨其闭户著书,则又冥想虚摹,或即以戏场为规模,其不为越人谈冰也几希。”^{[4](3162)}其间洋溢着浓厚的社会文化批评倾向,展示出作者良好的文化素养与缜密的思维习惯。其二,中国小说在具体的叙事状物上不及西人。解弢论小说,讲求从琐细处见工夫,所谓“小说之擅长处,在能琐屑”。故而其比较中西小说时,常深入文本内部,从细节处分出高下,以如此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就更能落到实处。《小说话》认为:“吾国小说,惟《红楼》能擅此技,然赖乎白话耳。”而除《红楼梦》外,中国小说在细节描写上都不可与西人比短论长。他

以写景为例，谈道：“写景之佳，吾于《红楼》而外，最服膺西籍，如立镜摄影，纤细不遗。吾国文人思致，鲜及其致密。”^{[4](3194)}他曾明确说过“刻画物状，亦推西籍”，认为即便是作为中国小说巅峰的《红楼梦》，也多有不及西方小说之处。《小说话》举《喂血酬恩记》对童子哭状的描写为例，说“此种笔墨，惟妙惟肖。吾中籍虽《红楼》之细腻，亦不及此”^{[4](3170)}。立论有理有据，不落于空谈，从细节处入手，使得小说之优劣豁然显现。

当然，解弢的比较文学批评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即其评价西方小说所依据的基本都是当时的翻译作品，非第一手材料，加之当时翻译中时常出现的不规范性操作，可能会导致其相关批评不符合文本实际，从而对西方小说的评价或有拔高之嫌。同时，解弢对西方小说也没有做到全面掌握，而贸然比较中西小说之优劣，多少也有因未能周览而立论欠稳的毛病。但比较文学批评的使命即是要在比较中呈现本国文学的真实相貌，“比较文学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到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离眼睛太近或太远的东西我们都看不真切”^{[15](1)}。《小说话》中的一系列比较批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比较文学领域，推动西方文学在中国的诠释与传播，更对中国古典小说有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而辩证的认识，其细致而精到的点评使得后人更理性地认识这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也从细节上为后来的小说改良提供了某种镜鉴。

四、结语

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研究转型的关键时期，旧的研究传统渐渐退场，新的学术范式日渐确立。小说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域外的影响至为重要。“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进了研究工作

的现代化进程。”^{[16](2)}新式学术组织的成立，新型学术期刊的创建，论文式学术写作的推进，尤其是西方学术思维的浸润，古典学术的研究也日趋体系化。相应地，传统的札记式的较零散的学术写作习惯渐退居幕后，诗话等话体批评首当其冲，在后来的学术史梳理中被冷落甚至被遮蔽。事实上，传统的话体批评研究等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与新学科的创建过程中也是居功至伟，不可因其形式偏于传统而对其现代性的质素视而不见。解弢的《小说话》就昭示着传统的话体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在西潮汹涌的近代并没有衰歇。就清末民初这一中国小说批评转型的关键时期而言，《小说话》不仅扩大了小说话这一传统批评形式的影响力，还从具体的文本批评上改变了晚清以来小说批评重影响研究而轻技法探索的倾向，真正系统地关注小说创作技巧的得失。尽管其行文或过于看重个人体验，叙述或过于简略，但多经验之谈，足资后人借鉴。他以简洁灵活的方式纵论中西小说，拈出“小说之擅长处，在能琐屑”的秘诀，深入小说文本，关注小说的细节描写，开拓小说审美研究的边界，客观上给经典与非经典小说以同等的观照。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小说的镜鉴下，重新审视中国小说的艺术成就，得出发人深思的结论，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注释：

- ① 解弢《小说话》：“盐山县在吾沧之东，实海滨斥卤不毛之地。”参见黄霖：《历代小说话》，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3181页。
- ② 解弢《小说话》：“吾少年旅行京国。”又曰：“辛丑客京师。”参见黄霖：《历代小说话》，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3174页、第3163页。
- ③ 解弢《小说话》：“北京地安门外兵仗局顺天中学，即《孽海花》于敏之故宅。余初在彼肄业时，尚未见《孽海花》一书。”参见黄霖：《历代小说话》，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3189页。
- ④ 解弢《小说话》：“余为革党，党中规约，以念母为大戒。”参见黄霖：《历代小说话》，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3211页。
- ⑤ 其实晚清小说理论界对梁启超倡导的小说观点也有反

驳与纠正。连载于《新小说》的《小说丛话》就多有反拨。参见胡全章:《“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其他如徐念慈、黄人在讨论小说性质时也提出不同意见:“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徐念慈《小说林缘起》);“小说者,文学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黄人《小说林发刊词》)。但这些观点或失之笼统,或流于零碎,在小说整体创作论上尚未有明确而具体的看法。

- ⑥ 目前学界对纯谈写作方法的著作是否属于话体批评还有争议,但若依《许彦周诗话》对诗话内容“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的概括,则分析句法、章法、文法等也是话体批评中不应忽视的部分。

参考文献:

- [1] 黄霖. 关于中国小说话[J]. 中国文学研究, 2018(2): 20-28.
HUANG Lin. On Chinese fiction notes[J].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8(2): 20-28.
- [2] 袁进. 试论民初小说理论[J]. 社会科学, 1997(3): 66-70.
YUAN Jin. On the theory of novel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J]. Social Sciences, 1997(3): 66-70.
- [3] 管达如. 说小说[C]//黄霖. 历代小说话.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9.
GUAN Daru. Taking about fictions[C]//HUANG Lin. Fiction notes of past dynasties. Nanjing: Phoenix Press, 2019.
- [4] 解弢. 小说话[M]//黄霖. 历代小说话.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9.
JIE Tao. Fiction notes[M]//HUANG Lin. Fiction notes of past dynasties. Nanjing: Phoenix Press, 2019.
- [5] 胡适. 论短篇小说[J]. 新青年, 1918(5): 32-44.
HU Shi. On short stories[J]. New Youth, 1918(5): 32-44.
- [6] 黄人. 小说小话[C]//黄霖. 历代小说话.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9.
HUANG Ren. Scrappy taking about fiction notes[C]//HUANG Lin. Fiction notes of past dynasties. Nanjing: Phoenix Press, 2019.
- [7] 邱炜菱. 客云庐小说话[C]//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QIU Weixuan. Fiction notes in Keyunlu[C]// A Ying. Collections of studies of fiction and opera about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 [8] 昌分. 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世界文学史[N]. 社会科学报, 1990-03-22.
CHANG Fen. The first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by the Chinese[N].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1990-03-22.
- [9] 孙毓修. 欧美小说丛谈[M]//黄霖. 历代小说话.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9.
SUN Yuxiu. On European and American novels[M]. HUANG Lin. Fiction notes of past dynasties. Nanjing: Phoenix Press, 2019.
- [10] 陈文新. 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
CHEN Wenxin.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literary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18(6).
- [11] 鲁迅. 致王冶秋[M]//鲁迅全集: 第1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LU Xun. To Wang Zhiqiu[M]// Complete collection of Lu Xun: Volume 13.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05.
- [12] 陈平原. 小说史: 理论与实践[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CHEN Pingyuan. History of novels: Theory and practice[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3] 鲁迅. 摩罗诗力说[M]//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LU Xun. On the power of Mara Poetry[M]// Complete Collection of Lu Xun: Volume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05.
- [14] 乐黛云. 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J]. 新东方, 1998(3): 49-57.
YUE Daiyu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J]. New Oriental, 1998(3): 49-57.
- [15] 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 张道真, 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BRANDES G. The mainstream of literature in the 19th century[M]. Trans. ZHANG Daozhen,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97.
- [16] 王瑶.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WANG Yao.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下转第 177 页)